

周作人留日前的三篇英译汉小说与 日本之渊源续考¹

宋声泉

论文摘要：早在 1906 年留学日本之前，周作人已经发表或出版过 6 篇（部）有译之成分的小说作品。《侠女奴》是学堂译法的翻版，偏向逐句逐词译，但因能力不到，只能借助英和字典的和制汉语。而后，以山县氏的和文译注本作为参考，使周作人有条件译出其英语能力不足以应对的《玉虫缘》和《荒矶》。随着周作人成为《女子世界》的重要供稿人，而《玉虫缘》《荒矶》这类直接提供和制汉语参考的底本又一时难再求得。于是，转向创作似乎是必然的选择。可是，自身的创作才能又有缺欠，故而《女猎人》《孤儿记》这种对英语原作随我取用的创作小说也便应运而生。表面上看，1906 年以前，周作人似乎有直译和改译两种译法，但实际上，《女猎人》与《孤儿记》更接近于有本事参考的创作，而非译作。

关键词：周作人；英译汉小说；《侠女奴》；《玉虫缘》；《荒矶》；

早在 1906 年留学日本之前，周作人已经发表或出版过 6 篇（部）有译之成分的小说作品。依动笔时间顺序计，大致是《侠女奴》《玉虫缘》《女猎人》《荒矶》《天鹦儿》《孤儿记》。这一时期可称为周作人译者生涯的初始阶段。然而，吊诡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欧化与‘五四’新体白话文学的生成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8CZW037）。

的是，倘若细致地将英文原作与周氏译作相对照，可以发现周作人译其第一篇小说《侠女奴》时最为认真；对待《玉虫缘》《荒矶》，也基本上是贴着原作的感觉译。但《女猎人》是“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甚至“人名地名，亦半架空，无所据也”²。至于《天鹦儿》，删改甚夥。³而《孤儿记》本为创作，直到小说后半才把“罽俄”（通译为雨果）文章“尽量的放进去”⁴，但也远不是老实的翻译。如此看来，周作人的这6篇（部）作品似乎存在着两种类型：一者偏于直译，一者实为改译。那么，何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同一位译者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译法选择？其中，译《侠女奴》之终篇到《女猎人》的完成，只间隔不足一月，但文本面貌迥然有异；而此后的《荒矶》之译法又接近于《玉虫缘》，《孤儿记》的作法则近乎《女猎人》的翻版。看似整齐的两种文本类型，实际上又彼此交替出现，其凌乱的表象令人费解。到底应当如何理解周作人这批所谓的早期翻译文本？

新世纪后，大陆学界、出版界对周作人的翻译愈发重视，集中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⁵然而，长期以来，有关周作人留日前的译作几乎是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所幸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对《侠女奴》《荒矶》《玉虫缘》皆有翔实的系列研究，笔者得以步其后尘，在详细考证周作人江南水师学堂时期的英语习得的基础上，

2 会稽萍云女士（周作人）假造：《女猎人》，《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号，1905年7月。《女子世界》是周作人留学日本之前发表作品的唯一阵地，刊载其各类文本近十篇。周作人在小说林社出版的几种翻译小说，亦皆仰赖《女子世界》编者丁初我的帮助。周作人发表于《女子世界》之诸作系年，长期标注有误。《女子世界》原计划为月刊，每年出版12期，每月一期；但由于各代派处拖欠报款问题严重，因此，《女子世界》从第10期开始出版延误。谢仁敏在夏晓虹、宋声泉、栾伟平诸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时报》广告，考证了《女子世界》的出版时间，并对周作人相关文章的见刊时间做了更正。本文所涉周作人发表于《女子世界》之作品，皆从谢氏。详见谢仁敏：《〈女子世界〉出版时间考辨——兼及周氏兄弟早期部分作品的出版时间》，《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

3 笔者将另文探讨。

4 作人：《学校生活的一叶》，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2》（一九一八～一九二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6页。

5 相关情况可见黄开发的梳理和评述。黄开发：《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第80-81页。另可补充的是，止庵2012年、201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及其增订本。研究专著方面，还有于小植：《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推进了相关讨论。⁶本文拟通过对《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做整体观照，围绕这三篇周作人留日前的英译汉小说的日本渊源问题，或加究明，或予补证，并尝试对前段所提出的问题做以解答。

一

《侠女奴》是周作人的第一篇译作，自1904年8月分四次连载于《女子世界》，后由小说林社出版单行本，亦即《天方夜谈》中家喻户晓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译本。周作人一生中曾屡屡忆起他的这篇译作及其所据的《天方夜谈》底本。去其重复，稍加归纳，可得如下信息：

1904年4月底或5月初，周作人在南京收到了鲁迅从日本寄出的邮包，其中有一册无编译者姓名的英文选本《天方夜谈》。该书是用来赠给小孩的礼品书，装帧华丽，价格三先令六便士，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的插画本；其中有两幅插图：一是阿拉丁拿着神灯，头上拖着小辫子，一是阿里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周作人原本打算翻译阿拉丁的故事，但因敏感于主人公被设置为“支那人”及头顶小辫的插图带有的侮辱意味，转而选译阿里巴巴的故事，更名为《侠女奴》，送登《女子世界》。⁷

在周作人1920年代初到1960年代的文章里，这些追忆反复出现。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研究者对其所述内容坚信不疑。直到新世纪之初，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英国图书馆认真查阅了伦敦纽恩士公司1899年版的插画本之后，因未见周作人多次说到的两幅插图，故而断言此版《天方夜谈》并非《侠女奴》的底本。2007年，樽本照雄又发表新作，判定《侠女奴》的真正底本是1877年劳特利奇公司出版的《天方夜谈》。但让他困惑的是：该版《天方夜谈》并未标明

6 樽本教授及笔者的多篇相关研究，后会逐一介绍。

7 周作人忆及《天方夜谈》的文章有《学校生活的一叶》（1922）、《〈蒙古故事集〉序》（1930）、《旧日记抄》（1936）、《小说的回忆》（1945）、《补遗二：鲁迅在东京（三四）》（1951）、《老师：学堂生活（二一）》（1951）、《〈天方夜谈〉：学堂生活（二三）》、《老师一：知堂回想录（四一）》、《我的新书一：知堂回想录（五一）》等。

售价，且书是鲁迅自日本所寄，周作人也没有支付的经历，为何周作人清晰地记得书的价格是三先令六便士？⁸

与一般书籍不同，《天方夜谈》是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流传成书的过程十分漫长，本就存在形态各异的多手抄本；在传入英语世界后，因其魔幻神秘的异域气息，甚为畅销。因此，周作人在1904年可以读到的英文版《天方夜谈》可能不下百种。笔者曾借助多家英文电子书数据库，翻查了几十种⁹，其中也包括1899年版伦敦纽恩士公司的插画本，且在纽恩士的出版记录中似乎也只有这一版。最终确定《侠女奴》的底本就是劳特利奇版，但不是1877年版，而最有可能是1890年版。仅1904年以前的劳特利奇版《天方夜谈》，1877年版之外，笔者就寓目7种。1890年版独有而其它各版所无的是一份广告页，内有“BOOKS FOR BOYS”（给男孩子的书）的提示，并注明价格为“3s.6d”（三先令六便士）。相关情况，笔者已做考略¹⁰，当时限于刊物篇幅，未能将樽本教授的贡献详细列举，特此补述。

考订底本后，再比对周作人的译文与原文，可以发现通行说法不可靠。《侠女奴》并非“意译”“豪杰译”，而是接近“直译”，甚至常常是逐词译。这完全超乎了一般的想象。因为学界通常认为，晚清以“意译”为风尚；认为周作人在留日前受林纾和梁启超的影响，也是“意译”；认为周氏兄弟是在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之后才走向直译。那为什么早在1904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周作人，在第一次翻译时，竟然采用了与译界潮流相悖的译法呢？

通过查考，笔者追踪到：这似乎与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所受的英语教育密切相关。周作人的翻译成就很大，但研究者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他的外语是怎么学来的。其日语、希腊语，是留学日本之后才会的，英语则是在江南水师学堂中习得。随后，笔者以《周作人日记》为线索，辅以众多材料，翔实地梳理了

8 樽本照雄：《周作人漢訳アリ・ババ『侠女奴』物語》，《清末小説》第26号、第27号，2003年、2004年；《周作人漢訳アリ・ババの英文原本》，《清末小説》第30号，2007年。

9 所查具体版本，详见附录。

10 宋声泉：《〈侠女奴〉与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5期。

周作人学英语的过程，并大致考证出他所学英文课本，即商务印书馆的“华英”系列教材以及所用语法参考书，甚至具体到周作人在什么时间学到哪册书。仔细阅读周作人的课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侠女奴》的翻译方法与它们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对应关系。¹¹这就找到了《侠女奴》直译或“逐字译”的来源，也为我们重新理解晚清翻译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往研究晚清翻译多着眼于政治性的翻译和商业性的翻译，所以看到的是“意译”为风尚，而当时新式学堂出身的译者或许会有一些不同。

前面的铺垫虽然略长，但对讨论周作人译《侠女奴》的日本渊源却非常必要。因为将《侠女奴》英文底本与周作人学英语教材相对照，可以发现仅凭其学堂所学尚不足以完成译文的翻译。底本里语法超纲的部分虽然也有，但不严重。最麻烦的是词汇。粗略统计周作人所学的五册英语教科书，所收单词总量不超过四千，即便全部掌握也还达不到当下英语四级的水平。何况周作人还未必都能记下。而且，周作人所用英文教科书在编排上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不利于掌握单词，通常是一词一意。但英语中一词多义甚至一词多性都相当普遍。即便记住一个词的某一义项，换个情景，它可能仍是陌生的。

可以补证的是，周作人当时非常着迷于《天方夜谈》，迫切地希望翻译其中的几篇故事；从他拿到《天方夜谈》到所译《侠女奴》第一节被发表，只用了三个多月；但他译后面的三节，却拖了半年多，也没有按计划译出《天方夜谈》的其他故事。这已经令人感到奇怪。而且劳特利奇版的《天方夜谈》是专给小孩的书，英文表达相当简单。他为何译得如此辛苦？甚至译完后还在日记里写下“如释重负，快甚”¹²。这也能证明周作人此时的英语能力不足以应对翻译。

那周作人如何在英语水平不够的情况下，完成了《侠女奴》的翻译呢？笔者推断他应该是借用了字典，于是考证出了周作人在水师学堂时期可能用到的四种英语词典，分别是“那泰耳英文字典”、《英字指南》《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和《新

11 宋声泉：《晚清学堂教育与文章变革——以周作人为中心》，《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2 见周作人乙巳年二月十四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译英和辞典》。表面上看，周作人翻译《侠女奴》时最有可能参考的是《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因为它日后在周作人的自述中至少出现过七次。但事实上，周作人用的是《新译英和辞典》。他只在不起眼的地方提到过一次。这本辞典是1902年鲁迅从日本寄的。但当时的周作人英语刚刚入门、日文完全不通¹³。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用这本英和辞典，将英语翻译成中文。

笔者在《侠女奴》第一节对应的英文原作中，遴选了若干高阶词、高频词和疑难词等，将它们分别对应到《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和《新译英和辞典》的解释中，再比照周作人采用的译法。结果一目了然，至少有38个词是《商务书馆华英字典》没有而《新译英和辞典》独有的义项。可以肯定周作人主要是依照后者译出，虽不懂日语，但借用了其中的汉字。而且周作人的选词也特别有意思。如在“商品/商貨”间选“商品”，在“記憶力/記性”内用“記憶力”，于“目的/志向”取“目的”。择词标准十分一贯，即以带东瀛文体色彩的新词为上选。¹⁴

不妨追问的是，周作人为何会选择《新译英和辞典》而非《商务书馆华英字典》来检索词义？1953年，周作人曾为其壬寅年（1902）旧日记做注，称《新译英和辞典》“比那时上海考贝纸印的《华英字典》（内容实是英华，因为是用华文来释英文的），要更为详备”¹⁵。似乎最简单的解释可以说，周作人认为《新译英和辞典》“更为详备”。但毕竟他不通日文，只能借用日文辞典的汉字。如此借字势必带来译文的艰涩。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不惜放弃使用《商务书馆华英字典》

13 周作人第一次接触日语或许是在1902年，当时鲁迅携至南京的书中有梁启超所编辑之《和文汉读法》。但是这本书并非是给周作人看的，而是鲁迅“预自带去”（见周作人壬寅年二月初八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20页）的。因此在周作人日记中看不到他有阅读此书记录。日后他回忆说：“《和文汉读法》我在三十年前曾一见，现今手头没有此书，未能详说，大抵是教人记若干条文法之后删去汉字下的语尾而颠倒钩转其位置，则和文即可翻为汉文矣。”（周作人：《〈和文汉读法〉》，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6》（一九三二~一九三五），第640页）这个“曾一见”即为鲁迅带去南京时，他曾见过，然而也只是“一见”而已，只能说个大概，或是鲁迅告知他的，至于具体规则是不清楚的。在当时，连鲁迅尚未能掌握《和文汉读法》看似极为简易的“颠倒钩转”之法，仍需携带附日，更不必说只粗粗看过一眼的周作人了。

14 详见宋声泉：《江南水师学堂时期“原周作人”的肇基——以四本字典的考订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8期。

15 周遐寿：《壬寅四·旧日记中的鲁迅（二一）》，《周作人散文全集12》，第490页。

典》更接近国人表达习惯的释义呢？这也涉及到《侠女奴》译出的日本渊源问题。

学界一般认为，甲午战败后，国中士子觉醒，一改对日本的想法。大的方面看，固然如此。但对周作人来说，在到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之前，尽管海战已过近20年，日本在他的思想中仍是反感的存在。这从他1898年至1901年的日记中可以很明显的感知。

然而，至江南水师学堂后，周作人开始频繁接触到与东洋相关的信息。首先是他的哥哥留学日本。他曾抄录友人胡韵仙给大哥的赠诗，诗序中有言“兹闻兄有东瀛之行，壮哉大志，钦慕何如”¹⁶。这大概也是周作人的心情。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常常记述鲁迅在通信中所言之有关日本的内容。其次，同样在1902年，周作人在新式学堂的环境里广泛阅读了新学书籍。细读其日记，可知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从1902年初春读《时务报》开始，周作人对梁启超的著述广泛搜求，屡有抄录，痴迷地追看“率皆饮冰子所著”的《新民丛报》，甚至“看至半夜，不忍就枕”；还称许《现世界大势论》“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夸誉《饮冰室自由书》与《中国魂》“美不胜收，令人气壮”。¹⁷不少梁启超的书，周作人都读过不止一遍。

此外，周作人当时的日记中所录译自日本的读物越来越多。自1902年后半，周作人的思想渐趋激进。这与其阅读资源的变化分不开。此一时期特别是1903年以后，周作人日记所载之读书记录，除极偶尔有读《古文苑》的几日外，几乎以新学书籍为主。在记其购阅《生物之过去未来》时，特别写下“日本横山又次郎著，无锡秦毓璠、胡克猷译，二君本在此间，不合于俗，去而东游，今且译书，以饷国民矣，为之忻羨不已”¹⁸。当他听说水师学堂新任总办黎锦彝拟择学生四人随往东洋后，即刻动心，筹划此事。两日后，他与另外三名同学上午“共议出

16 见周作人壬寅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21页。

17 见周作人壬寅年正月初四、初六、初八日，六月初十日，七月初三日、初四日、初六日、初七日、十四日，十月初六日、初七日，癸卯年二月初四日、二月廿四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08-309、339、344-346、357、375、379页。

18 见周作人壬寅年十二月初七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65页。

洋事，决计同方总办面商”，听说“方在下关”，便立即前往，但未能见成，虽经挫折，当日最终还是见到总办，“请往东洋”，却以“所派者皆卒业生”而遭拒。¹⁹ 尽管未能成行，但周作人产生了负笈东瀛的强烈愿望。他表面上答应着“伯文叔”放弃东游，却依旧心心念念，在日记中写下：“我志已定，不可复夺，徒喋喋也。在此处如在荆棘丛莽中，予早蓄振脱此难之志，倘东游消息的确，吾志遂矣，人言不可恤也。”²⁰

日本成为了周作人的理想之域，去之不得，反过来更加激化了他对现实的不满意识。他痛贬张之洞的《劝学篇》“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目睹官场迎送，感慨“中国普遍压制，随在皆是”及与身者“可谓无血气无脑筋”；得知被安排待宴，抒发“吾等又须为皂役奴隶站班磕头”的牢骚，事后则暗骂“在上者只知巴结上司，役使吾辈如牛马”。²¹

思想的不满又会转化为行动的取向。他因友人讲述日本弘文学院学潮风波之事，受到牵连，被学生监恐吓，“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对此，周作人在日记里激昂地写下“大丈夫生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²² 所谓“脱此羁绊”，即指留学日本。此事给周作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刺激，自言“愤气填膺”；然而他愈挫愈勇，公派留日无望反而激起了周作人学习日语的意志，第二日从“均公”处借来日语书，预备自修；第三日早起，七点“看日本语”，却因“初学不能解”，便也不得不罢手了。²³ 自此，南京学堂时期的周作人日记中未有关于日语方面的记载。

有意味的是，“脱此羁绊”之志又恰恰与《侠女奴》译文最大的一处改动存在互文的关系。在劳特利奇版的原文中，阿里巴巴只是对曼绮那宣布了自己的决

19 见周作人壬寅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66页。

20 见周作人癸卯年二月廿二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78-379页。

21 见周作人壬寅年七月廿八日，十月初八日、初十日，癸卯年二月廿二日、廿三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48、357、378-379页。

22 见周作人癸卯年三月廿一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86页。

23 见周作人癸卯年廿二日、廿三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86-387页。

定，并未征询她的意见，而是去劝说儿子，随后为两位新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也就是说，曼绮那实际上是“失声”的。周作人则突出了女奴的主体性，改为“曼夷然曰：‘除患，吾分也。吾不敢邀非分之福，且予自行心之所安，富家妇何足算？吾勿愿也。’卒不许”；并于结尾处，增言“曼绮那其后不知所终”。周作人给曼绮那设计的新结局正是“脱此羁绊”，而这也是抒发个人愤懑情绪的文字出口。

周作人的激进化也同时表现在其文字方面。他自谓“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还激愤地说，“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甚至自况“宁使人目为武夫，勿使人谓作得好文章也”。²⁴他所倾慕的梁启超的新文体不仅不忌以和制汉语入文，反而“杂以外国语法”是梁文的鲜明特色。如此想来，周作人选用《新译英和辞典》，恰恰可以使之实现向其偶像看齐的愿望。

综上，周作人译《侠女奴》的日本渊源是对《新译英和辞典》的借用，而这选择的背后又有着日本作为理想国的驱动，并投射着其对水师学堂乃至清政府的彻底失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译本《侠女奴》，拆解开来，内里包藏着一名晚清少年心灵变革的密码。

二

据笔者统计推测，周作人翻译《侠女奴》第一节这三千字的故事，就需要翻阅数十次乃至上百次字典。由此来看，译完四节《侠女奴》，他日记中感慨的“如释重负”，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吊诡的是，如此特殊的翻译经历，周作人日后的屡次回忆中竟然只字未提。他准确地记得《天方夜谈》的装帧、插画、价格、用途等繁多的细节，也清晰地记得《天方夜谈》在其生命中的意义，甚至说它是其杂学师传的“第一个”，说它作了他“外国语的老师”。并且终其一生，周作人都非常重视字典在翻译中的作用，《侠女奴》的译出即是这一理念的起点。然而，

24 见周作人壬寅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61-362页。

他却独独忘记了对《新译英和辞典》的借用。到底是选择性的记忆与遗忘，还是有所隐瞒呢？对此，不妨见仁见智。

与探寻《侠女奴》日本渊源的颇费周章相比，《玉虫缘》的日本渊源似乎一目了然。《玉虫缘》的《例言》中即已揭示：“是书英文原本名曰《金之甲虫》，著是事之原始也。日本山县氏译本名曰《掘宝》，著事之结果也。译者不解和文，而于英文少有涉猎，因从原本絀绎成此，别著其名曰《玉虫缘》。”²⁵或许是轻信了《玉虫缘》的《例言》，国内的研究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文注本不予注目。同样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最早指出了《玉虫缘》的译出与山县氏译本《掘宝》的关系。²⁶2014年，北京大学的周旻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通向直译的十字路口——周作人〈红星佚史〉研究》中也有过分析。²⁷笔者因有对《侠女奴》的前期研究，故而在对《玉虫缘》如何以日译为中介方面做了更为细致的补证，特别是通过对比《侠女奴》之译法，大体厘清了周作人译法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因素。²⁸这里不妨继续拓展相关讨论。

周作人有关《玉虫缘》的回忆，集中在“知堂回想录（五二）”《我的新书二》里。为便于论述，大段征引于下：

《玉虫缘》这名称是根据原名而定的，本名是《黄金甲虫》（The Gold—bug），因为当时用的是日本的《英和辞典》，甲虫称为玉虫，实际是吉丁虫，我们方言叫它做“金虫”，是一种美丽的带壳飞虫。这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著者的友人名莱格澜，避人住于苏利樊岛，偶然得到一个吉丁虫，形状甚为奇怪，颇像人的枯颅，为的要画出图来给著者看，在裹了吉丁虫来的偶从海

25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一八九八～一九一七），第35页。

26 樽本照雄：《ポ一最初の漢訳小説》，《大阪経大論集》第52卷第5期，2002年。

27 周旻将硕士论文中与《玉虫缘》相关的部分加以扩充、丰富之后，单篇发表。周旻：““隐形”的底色：英和双语读本在周作人早期翻译生产中的角色——以《玉虫缘》为个案》，《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4期。

28 详见宋声泉：《〈域外小说集〉生成前史之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边捡得的一幅羊皮纸上，画了图递给著者的时候，不料落在火炉旁边了，经著者拾起来看时，图却画得像是一个人的骷髅。莱格阑仔细检视，原来在画着甲虫的背面对角地方，真是骷髅的图，是经炉火烘烤出现的，而在下方则显出一只小山羊，再经洗刷烘烤，乃发现一大片的字迹，是一种用数字及符号组成的暗码。他的结论是这是海贼首领甲必丹渴特（Kidd）的遗物，因为英语小山羊的发音与渴特相同，而骷髅则为海贼的旗帜，所以苦心研究，终于将暗号密码翻译了出来，掘得海贼所埋藏的巨额的珍宝。……这篇《玉虫缘》的原文系依据日本山悬五十雄的译注本，系是他所编的《英文学研究》的一册，题目是《掘宝》。²⁹

首先，值得讨论的是“玉虫”的译法。按周作人的说法，他“当时用的是日本的《英和辞典》”。有趣的是，译《侠女奴》时的借用，他不提；反倒说将 bug 译为“玉虫”是由查阅辞典所得。但笔者翻阅神田乃武等编的《新译英和辞典》，却发现 Bug 条的注释并非“玉虫”，而是“(動) 椿象(カメムシ)類の諸蟲・ナンキンムシ”³⁰。椿象或者ナンキンムシ(南京虫)皆指臭虫，和被誉为虫中之“淑女”的散发着金绿色光彩的吉丁虫³¹不可同日而语。再查 Gold Bug，则《新译英和辞典》未收该词条。其实，“玉虫”便是山县氏在《宝ほり》中用来指称那只黄金虫的固定叫法。如“一つの玉蟲を狩り出し”，“その玉蟲は全く新らしきもの”、“羽の他は純金の玉蟲ですがよ”，全文中“玉蟲”二字几乎随处可见。按《玉虫缘·例言》的说法，因为“译者不解和文”，是从英文译出的，似乎不需注意所谓的“山县氏译本”，但事实并非如此。对此，樽本教授的研究已经十分详尽。笔者也进一步讨论过相关情况，即周作人在不通日语的情况下，以日语本为中介，对其译文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看来，《玉虫缘·例言》所谓“从

29 《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94页。“山悬五十雄”应为山县五十雄。

30 神田乃武等编：《新译英和辞典》，東京：三省堂書店，明治三十五年（1902），第136页。

31 顾茂彬、陈仁利主编：《昆虫文化与鉴赏》，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原本紬绎成此”的说法是故布迷障，有意遮盖事实。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周作人确实使用过《新译英和辞典》译《玉虫缘》，但主要是为了对付英文专有名词。因为“山县氏译本”是以假名方式标出此类词汇，无汉字可借用。周作人一般采取译音的方式来译英文专有名词，但却未将“Amontillado”写为阿蒙提拉度一类的词，而译为“泻梨”。此当是查阅了《新译英和辞典》的缘故，该书即注解“Amontillado”为“一種ノ淡色シュリ酒”³²。所以周作人也注明其为“酒名”。“泻梨”其实是日语“シュリ”的音译。由此，不难察觉到一种叙述的错位，即《侠女奴》主要是靠《新译英和辞典》译出，但周作人只字未提；而《玉虫缘》基本上是借助了山县氏的日文译注本，但周作人回忆称直接从英文译出且译“玉虫”这类重要的词时借助了《新译英和辞典》，然而事实非也。这里当然不能排除周作人误忆，出现了张冠李戴之误；但同样也不能排除刻意造史的可能性。

其次是与《英文学研究》相关的问题。《英文学研究》是山县五十雄在1901年至1903年间译注的六部作品，每年两本，其中第三册是《英米诗歌集》，其余五册皆为小说，分别为《白梅嬢》《荒磯》《婿選び》《宝ほり》和《該撒殺害》。整套图书编排体例基本一致，每册先后依次为英文原文、作者小传（日语）、繁难词句注释、日译前言、日文译本，非常适合英语初学者的使用。

关于这套书的来源，周作人曾说：“《英文学研究》，一共有四五本，只记得其一是朗佛罗的长诗。这些原书都是鲁迅寄来的，大概是在甲辰年内收到的吧，日记上却未有记载，恐怕是在日记断缺的期间中也未可知。”³³可能鲁迅当时只寄给他“四五本”，抑或周作人记错了册数，但总之是鲁迅寄自日本的当无疑义。所谓“朗佛罗的长诗”即在《英米诗歌集》中。关于邮寄的时间，大概也确如周作人所回忆的那样。从周作人日记来看，鲁迅自1902年留学日本后，与弟弟保

32 神田乃武等編：《新譯英和辭典》，第34頁。

33 周遐寿：《乙巳·旧日记中的鲁迅（二五）》，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2》（一九五二～一九五七），第499页。

持着频繁的通信，并陆续寄回过多种图书如《最近清国疆域分图》《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摩西传》《浙江同乡会章程》《权利竞争论》《雷英余声》《林和靖集》《真山民集》《朝鲜名家诗集》《天籁阁》《西力东侵史》《世界十女杰》《生理学粹》《利俾瑟战血余腥录》《月界旅行》等，还有《浙江潮》《新小说》《清议报》《新民丛报》《译学汇编》等杂志若干。³⁴ 鲁迅每次寄来图书，周作人在日记中都会详细地记录书名，有时还会记下出版信息。故而，未见于日记的《英文学研究》，应和周作人甲辰年（1904）日记的缺失有关。目前所见周作人日记，自甲辰四月至十一月的内容缺载。而乙巳年二月十四日（1905年3月19日），《玉虫缘》已然译竟。可推知周作人所言不差。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于英文也没有好感”甚至“反对英文的”³⁵ 鲁迅，为什么要给周作人寄日本人译注的英语文学丛书呢？更吊诡的是，周作人几乎不懂日语。关于鲁迅寄《英文学研究》的动机，一般来说很容易想到的是他帮助弟弟挑选了英语学习的读物。不过其实不能排除是周作人自发要求的可能。如前所述，《新译英和辞典》就是周作人自己向鲁迅提的要求。或许与托买字典的情况相似，当周作人尝试翻译的时候，他请鲁迅代买了英日双语的译本，也可顺便学习日语。即便不是周作人直接的托请，至少是在通信中向鲁迅说明过类似的需求。

《玉虫缘》究竟何时起手翻译的，已不得而知，但显系晚于《侠女奴》。周作人也说“《侠女奴》着手在前，因在报上分期发表，故全文完成反而在后了”³⁶。不过，说是分期发表的原因造成了延误似也不充分，因为周作人本可以先将《侠女奴》译出，等待陆续发表即可，却也是一直拖延。上一节已经分析了《侠女奴》的翻译之于周作人而言是一种负担。但同时期内译原文更难的《玉虫缘》却似乎较为轻松。这当要归功于“山县氏译本”《宝ほり》提供的便利了。周作人很多时候几乎是逐句逐词依照日译本而辅以英文来翻译的，譬如：

34 见周作人壬寅年九月廿五日、十一月廿九日，癸卯年二月十三日、廿一日、三月十二日，甲辰年“大寅宫之取书”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56、364、377-378、384、401页。

35 鹤生：《鲁迅与英文》，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1》（一九五一），第442页。

36 周作人：《我的新书二：知堂回想录（五二）》，《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93页。

島西端尽处，墨而忒列炮台在焉。其旁有古朴小房数椽，每当盛夏之交，查理士顿府士女之来避尘嚣与热病者，多僦居之。

島の西の端なるムールトリー炮臺の邊數戸の板造りの見すばらしき家ありて、盛夏の交チャーレストン府の士女等、蒼の紅塵と熱病とを避けんとて來る所に

彼藏书甚多，而取读之时则甚少。平常惟以銃猎及鱼钓为乐。又常喜逍遥于海滨草原间，采集贝壳、昆虫之类，以作博物学之标本。

彼は多くの書籍を藏せしかど、これを讀むこと稀にして、平常銃獵と魚獵とを樂しみ、又は海濱草原の間に逍遙して、貝殻昆虫等を採集し、博物學の標本を作りて喜びしが

彼乃于上衣之衣囊内，取出一册之手帐，将此纸郑重夹入，藏之于写字斜面几之抽斗内，而下键，而见出一种沉着之态度。前此热心之风，已全行消灭。

彼は上衣の衣囊より一冊の手帳を取出し、其中に彼の紙片を丁寧に疊み入れ、更に其手帳を机の抽斗に入れ、鍵を下ろしたり、彼の様子は前よりは沈着きて見えたれども、前の熱心の風は全く無くなれり

予读此书既毕，心忽大动。细玩文体，大异于莱平常之风度。不知彼之心中，究蕴若何新奇之理想？其所幻想，究为何事乎？彼所云非常重大之事件，将何以处置之乎？

余は此手紙を讀みて心中一方ならぬ心配を感じたり。其文體はレグラントが平常の風とはいたく異なる所あり、彼は如何なる事を妄想し居るなるか、何も「非常の大事件」といふ如き事を處置すべき筈なきに

约二小时，日将没，乃至一处，其荒邈寂寞，殆不经见。瞥见一片高原，在一小山之顶。此小山颇难攀登，自山麓以至山顶，皆树木丛生，茸密无隙。树与树之间，巨大岩石，罗列地上。

二時間ばかりにして、日の將に没せんとする頃、余等は今迄見たることなき程の荒涼寂寞たる所に來れり。ここは殆ど攀ぢ登り難き小山の頂上に近き一の高原にして、其小山は麓より頂上迄樹木密生し、樹と樹の間には巨巖地上に緊なく横はり

周作人只需将英语原文的意思读个大概，然后按照日语汉字的字面意思加以敷衍即可。最麻烦的地方是有的日语假名表达否定含义，如“答ふる者なく”中的“なく”，但比照英文，即不会译错。这类译法在《玉虫缘》中占据着的主要位置。当周作人以日译本为中介时，翻译活动仿佛变得容易了起来。大量的词汇不需再费时间翻查字典，也省去了选择的踌躇，甚至于句式结构也可以有所参照。

由于以日译本为借镜，使周作人具有了大致译出 *The Gold-Bug* 的可能性；但平心而论，爱伦·坡这部小说的难度远非周作人的英语水准所能驾驭，日译本可作参照时，翻译尚无大碍，倘若遇到假名过多，或罗列汉字亦难解的部分，便常常会出错。周作人没有能力处理过于灵活的句式或多重复句的翻译，于是他不得不删篡改原文：

In these excursions he wa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an old negro, called Jupiter, who had been manumitted before the reverses of the family, but who could be induced, neither by threats nor by promises, to abandon what he considered his right of attendance upon the footsteps of his young "Massa Will." It is not improbable that the relatives of Legrand, conceiving him to be somewhat unsettled in intellect, had contrived to instil this obstinacy into Jupiter, with a view to the supervision

and guardianship of the wanderer.

彼以喜游历原野故，故尝以一老黑奴自随。此黑人名迦别，乃莱先世未衰之时所释放者。人甚慧而忠于其事，不烦呵叱约束，自以伴侍主人天职。彼因莱有时忽发狂气，胸中常持一成见，守护视察之惟谨。而莱亦善待之，颇亲信焉。

除了前两句基本准确之外，其余皆误，特别是笔者标注的划线部分更是错得离谱。原文大意是说，莱格兰的亲眷们也可能是利用了迦别思维能力的不足，而向他灌输了即便获得自由也要侍奉少爷的观念，可周作人却把“unsettled in intellect”安在了莱格兰的头上。

《玉虫缘》中的错误还有许多，如把他自己遭受的一连串不幸使其陷入贫困（“he……had once been wealthy; but a series of misfortunes had reduced him to want”），译为“其先世颇饶于资，数传至莱，家道日落”；将天黑不久他们回来（Soon after dark they arrived）误译成“良久，天将昏黑，二人方返”；一个正要把纸片揉成一团的动作（was about to crumple it）被认为是完成了的“将纸片搓成一小团”；原本表达虚拟语气的“我是真想弄明白你现在说的这些啊”（I should like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you are talking about）则被完全弄反了意思——“汝之所言，我已略知大意”。

学者一般依据《玉虫缘·例言》中的“书系入作者口气，今仍其体例”，误以为周作人对原文的理解能力很强。实际上，这里所言“作者口气”无非是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全篇以“予”之口吻讲述，是显而易见，知道这一点也不能证明其英文水平。即便周作人有意保留迦别称呼主人时的奇怪语气，以及像译《侠女奴》那样，将原文中的插图场景和人物的语气词等也都尽量译出。然而，美式文章的幽默反讽的味道，仍是当时的周作人无法体会的。例如莱格兰在迦别插话后的一段回答：

“Well, suppose it is, Jup,” replied Legrand, somewhat more earnestly, it seemed to me, than the case demanded, “is that any reason for your letting the birds burn? The color”—here he turned to me

菜曰：“然然。予意亦如是。——其色诚可异。……”

言次复向予曰

这段译文中的标点，即为周作人译本原样，可以看到他已经很努力地去借助新的方式来还原英文语境的景象，以省略号表示说话对象的转变；但无论如何，周作人尚无法体会划线句“难道那就是你把鸡烧糊的理由吗？”的趣味，所以只好连同前面的话一并删去。另外，周作人虽可凭借日译本和别加注释的方式保留黑奴与他人交流时的部分语误，却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迦别形象丰富性的丧失。除去“加以移译则不复能分”的地方，周作人也有意地删去了许多迦别在对话中啰嗦散乱甚至词不达意的部分，还把前后三次出现的关于黑奴因莱格兰私自外出而想要狠狠揍他一顿的叙述径直去除，使得原文中迦别那种有些愚蠢、略带疯癫、插科打诨的人物形象难以完整呈现。

相较于《侠女奴》，周作人译《玉虫缘》的错误率明显升高。《侠女奴》原文容易，借助字典认真对待，尚可应付。《玉虫缘》的英文表达相当难解。一方面，作为侦探小说，悬疑之破解“在于暗码的解释，而其趣味乃全在英文的组织上”³⁷，这就对语言掌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书中黑奴“迦别”（Jupiter）的语言，倘若只读英文，常常是很难理解的。诚如周作人在《玉虫缘·例言》中所写，“书中形容黑人愚蠢，竭尽其致。其用语多误，至以 There 为 dar, it is not 为 taint, 译时颇觉困难。须以意逆，乃能得之。惟其在英文中可显黑人之误，及加以移译，则不复能分矣。（如英文‘故’Cause 可误为‘爪’Claws，而在中文则否，不加注语，便觉费解）”³⁸。譬如他最初登场时的

37 《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294页。

38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第35-36页。

一段话：

“Dey aint no tin in him, Massa Will, I keep a tellin on you”, here interrupted Jupiter; “de bug is a goole bug, solid, ebery bit of him, inside and all, sep him wing——neber feel half so hebby a bug in my life.”

这种发音不准所造成的满纸病误的语段，不仅完全超出了周作人的英语能力，即便是训练有素的英语学堂生恐怕也难以应付。好在有日译本的注释可以依凭。山县氏译注本针对 46 行、94-97 行疑难处的注释分别为：

“Massa Will.” 黑奴 Jupiter が其主人を呼ぶ語，即ち Master Will の訛にて，Will は William を親しく呼ぶ語，例へばここに義太郎といふ人あれば其親しき人之をよつちやんといふか如し。William は又親しく Bill とも呼ぶ。猶ほこれと同様の數例を序に示さんに，Charles は Charlie，Francis を Frank，John を Jack，Abraham を Abe，Thomas を Tom，Elizabeth を Beth，Jane を Jenny 等なり

“Dey aint no tin ……so hebby a bug in my life. 黑奴の訛りの言なれば読み慣れざれば解し難く見ゆれども，よく注意して其訛りを正しき言に直して読み試むべし。次第に慣れて後には容易に解し得るに至らん。試みに此一句を正しき言に直して示すこと下の如し

“They is not nothing in it, Master Will, I Keep on telling you, the bug is a gold bug, every bit of it, inside and all, except his wing-never feel half so heavy a bug in my life.”

周作人综合参照了这两条注释，将原本难以理解的段落译为：“迦别突然接口曰：‘麦撒威而（麦撒即密司脱之讹。威而为威廉之亲密称呼。如多马氏之称

汤姆，爱理查白士之称白士也），此虫空中无物，然甚重。除羽之外，殆皆为纯金所成。纯金之玉虫，予平生未见玉虫有如是之重者。’周作人主要是按照注释里提示的正确的句子译出的，《例言》中的“*There* 为 *dar*, *it is not* 为 *taint*”大概亦由此而悟出。³⁹

同时，为了保留原文中黑奴的口吻语气，周作人没有译注释内的“*Master Will*”，而是袭用了原句里的“*Massa Will*”；然而，正如周作人所担心的那样，“*麦撒威而*”的译语无法令中国读者体察到作者所以如此之用意，于是他加注说明，其内容则明显是由猜度引文第一段的注释而来。不过，原注已经说得很清楚，“*Massa Will*”是黑奴 *Jupiter* 称呼其主人的话，是“*Master Will*”的讹误；周作人却误以为是“密司脱之讹”，“密司脱”实为“*Mr*”（先生）的音译，在清末民初小说中常见，甚至林译小说中亦可见到。⁴⁰周作人出现这样的错误，既与不通日语相关，也是未认真查阅 *Master*（主人）的含义。

综上，略加推断如下：《侠女奴》的发表令周作人备感振奋⁴¹，同时他也受到《女子世界》编者丁初我的热情勉励及新的邀约。然而，周作人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即便应对《侠女奴》之译事已经力不从心。《侠女奴》原本分四期连载，但并非连续四期，实有中断，度其主要原因，当在周作人方面。恰于此时，鲁迅从日本寄来《英文学研究》，为周作人提供了方便之门，使之可以借用日译本的汉字而不需费力翻阅字典来译书，在提升了翻译效率的同时，也抬升了错误率。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作人译《玉虫缘》的日本渊源，实堪此评。

39 注释中的“*They is not nothing*”的“*They*”为排印错误，应为“*There*”；山县氏对第199行难词的注即明确写为“*Dar! there! なり。そこですつて。*”

40 参见吕叔湘的《三位一体的“字”》（氏著《语文常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2页）和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文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0页）。

41 周作人回忆称“（《侠女奴》）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兴起来，又将美国亚伦坡（*E. Allen Poe*）的小说《黄金虫》译出”。作人：《学校生活的一叶》，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2》，第825页。

三

与《玉虫缘》情况相同，周作人连载于《女子世界》第2年第2期、第3期的《荒矶》也是译自《英文学研究》丛书，即第二册《荒磯》。周作人在《荒矶·附言》中亦有过说明“此文本名 The Man Orom Achemgle，日译易曰《荒矶》，今仍之。译者未能读日译，从原本述出，拙不能文，甚自愧也。”⁴²

《荒矶》是周作人晚清时期译作中唯一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在《女子世界》连载时，标为“恋爱奇谈”。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讲述的是：“予”本为英伦内地小城市的辩护士，有强烈的厌世思想，不合于众；恰巧，其曾任高官的叔父病故，他分得一笔遗产和一片海边的荒地；于是他搬去荒地，心满意足地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某天夜里，风雨大作，有船失事，起初他因超脱生死而不予施救，后为险象环生的现场所动，还是救起了一名美丽的俄国少女“苏菲·简模生”；该少女活泼聪颖，“予”虽与之语言不通，却慢慢地由嫌恶而变得依赖；一日，一名不速之客出现在“予”之属地，在得知苏菲的情况后，闯入“予”家，欲带走苏菲，被拦下；原来该男子为苏菲之未婚夫，名“濠玕尼夫”，因苏菲移情别恋于他人，其将苏菲强行带到船上，计划至西欧行婚礼，不料遭遇海难；“予”尽管了解了男子的境遇，却因苏菲不愿与其接近，而屡次拒绝了他要带走苏菲的请求；数日后的一个暴风雨来临之前夕，濠玕尼夫趁“予”不备，强行带走了苏菲，夺小舟而离去，结果不幸双双遇难；当予发现他们的遗体时，看到“少女之尸，在其怀中！壮夫以手揽之，宛似保护之于暴风之中者”，“予”为之感慨不已，最终将他们安葬于海边荒地。

《荒矶》译本格外特殊，却极少为人所论及，不免有些遗憾。樽本照雄虽有讨论，但相较其对《侠女奴》和《玉虫缘》的研究来看，对《荒矶》的分析略显简略。⁴³笔者此前发表的文章也多点到为止⁴⁴，这里拟对重要问题加以相关延展：

42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第39页。《女子世界》原刊排印有误，The Man From Archangel 误为 The Man Orom Achemgle。

首先是关于日译的中介效应。或许，周作人《咐言》里的自述也不能算错，确实“译者未能读日译”，但绝不是简单地“从原本述出”。为了便于论述，先举《荒矶》开头的一段为例：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三月四日，予时年二十五，索居寡欢，旷观多感，叹尘缘之滓我，常作出世想，心殊郁郁，不能自广。时于手账中纪录一则云：

太阳系在无数诸统系之中，其大相亚，向“黑寇尔斯”星宿之方向而前行，漠然无知，淡然无为。惟是各自旋转于太虚之中，终古而不息。此诸圆体，旋转复旋转，无须臾之停留，无一毫之声息，亘千万年，盖常如此。虽有智者，莫测其何由也。此中之一，其为体也，最小最微，为固体与液体集合而成。吾辈名之曰地球。大地运转，我生以来，即已如是，殆老且死，亦终如是。是盖为一不可思议之怪物，其来何从，其去焉息，天壤茫茫，孰知其故？此运行不息之块体，外皮凸凹，厥名山川，有亿万蛆虫类之微生，蠢动其上，无能、无力、无目的、无秩序，徒是娟蠕牵引，扰攘于空气之中，其名曰人间世。我约翰·麦微汀，亦此等蛆虫之一也。此世间之状态，一般之人，必须竭其微小之体力，与些细之脑力，从事劳动，以博一种金属制之圆状物，用之购买化学的原素，以补肌肉之消耗，又必须辛苦拮据，搆为巢穴，隐蔽身体，用避不情天时之侵蚀。一生智力，尽消磨于衣食居处之中，而身外重大之问题，致无暇研究。夫人类之状况，既如此苦辛，而我辈则颇有得意之感，自尊自满，其愉快为何如？尘世劳劳，七情为祟，春蚕自缚，解脱者谁？噫！是非一大奇事耶？”

此之观念，实深中于予心。有时为外界之感情欲念所激动，辄令予引起此意，辗转心头，如辘轳然，放歌狂哭，不能自己。盖予之蓄主此意，厌弃人世者，已非一日，而归隐无山，莫可为计。

43 樽本照雄：《漢訳ドイル「荒磯」物語》，《大阪経大論集》第52卷第2期，2001年。

44 宋声泉：《〈域外小说集〉生成前史之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の三月四日、余は生年二十五歳なりし時、久しく心を惱まし思を苦めたる後、得たる所を我覺え帳に記して曰く、

太陽系は其大これにらざる無数の諸統系の中に在りて、ハーキュルス星宿の方に向ひ、黙々空間を轉廻しつつ進み行くこと永久絶ゆることなく、これを形成する諸の大圓體は、永久の空間中に寸時も止むことなく、毫厘の響をも出さずして、廻轉又廻轉す。此等諸圓體中に於て最小最微の一、液體と固體と集合して一塊となりたる者を、吾人名づけて地球といふ。此者余が生れし前より、前へと旋轉し、今も猶ほ旋轉中にて、余が死後も亦旋轉前進するなるべく、唯これ廻轉する一個の不思議物、何人も其何處より來りしか、又は何處に行かんとするか知る者なし。此動きて止むことなき團塊の外皮に、無能無力、蛆虫の如き者幾億萬蠢動し、何の目的もなく、徒らに空間に拉扯れ行く。余ジョン、まくヴイッチー亦此等蛆虫の一なり。さるに此世の状態たる、余は余の有する微少の軀力と些細の推理力とを専ら一種金屬製の圓狀物を得んが為めの労働に用みざるべからずして、こは以て我絶いず消滅し行く筋肉を補ふに必要な化合物を買ひ、又頭上大問題に思考を走らすの違あることなし。それ吾人は斯の如く憫笑すべき愚物のみ、而も時として心中多少の愉快を感ずることあり、のみならず自尊自重の念を起し、昂然得意を感ずることすらあり、其愚其味譬ふるに物なき哉。

こは實に我心中に深く根底を有し、常に心頭に上り來る思想を描寫したるものにして、一時の感情慾念の為めに變動するものにあらず。

On the fourth day of March, in the year 1867, I being at that time in my five-and-twentieth year, I wrote down the following words in my note-book —the result of much mental perturbation and conflict:—

“The solar system, amid a countless number of other systems as large as itself, rolls ever silently through spac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tellation of Hercules. The great spheres of which it is composed spin and spin through the eternal void ceaselessly and noiselessly. Of these one of the smallest and most insignificant is that conglomeration of solid and of liquid particles which we have named the earth. It whirls onward now as it has done before my birth, and will do after my death—a revolving mystery, coming none know whence, and going none know whither. Upon the outer crust of this moving mass crawl many mites, of whom I, John M’Vittie, am one, helpless, impotent, being dragged aimlessly through space. Yet such is the state of things among us that the little energy and glimmering of reason which I possess is entirely taken up with the labors which ar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cure certain metallic disks, wherewith I may purchase the chemical elements necessary to build up my ever-wasting tissues, and keep a roof over me to shelter me from the inclemency of the weather. I thus have no thought to expend upon the vital questions which surround me on every side. Yet, miserable entity as I am, I can still at times feel some degree of happiness, and am even—save the mark !—puffed up occasionally with a sense of my own importance.”

These words, as I have said, I wrote down in my note-book, and they reflected accurately the thoughts which I found rooted far down in my soul, ever present and unaffected by the passing emotions of the hour.

将中、英、日三种文字认真比照阅读，很容易发现周作人翻译方面的延续与

变化。延续体现在：《荒矶》主体部分仍用《玉虫缘》之译法，即依靠日译本的汉字来翻译英文，附以英文参照而不致于有错。变化之处在于：《玉虫缘》是脱开了英语原文的束缚，改以日译本来逐句译；而《荒矶》则进一步摆脱了日译本的掌控，常自出机杼，大加发挥。引文中笔者标注的四个句子，皆是周作人信马由缰、点染开来的结果。

不过，周作人的增饰并非率性而为的随意改译，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一是引文中的这类表达思想情感的地方，常有溢出之笔触，如“予”看到男尸抱紧苏菲尸身时的感慨“吁嗟壮夫，其行何莽，其情何深！生死不足惧，财产不足惜，而于娟娟此豸，不能忘情。殆至死生一发，犹能挥其强腕，以战风波，为之保障”，即为原文所无；有时叹息之余，甚至添上“三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样的晚清言情小说《花月痕》中的名句。

二是周作人加添之处多在景色描写。他此前的翻译主要是在句内的词组或句子之间的链接处添加细节场景。如《侠女奴》提到夜半，加笔曰“月黑星沉，残灯惨淡”，言及“天未明时即入城”，补写道“人声寂寂，尚无行道者”；《玉虫缘》写“屋外树棕榈数株”，跟着就添了“绿叶森森，一见立辨”。而在《荒矶》中亦如此，如添入些“碧水为邻，红尘不到”的景语；但不同之处在于会将原文中的单调叙述敷衍成写景的段落。如原本非常平淡的一句话“In front of the house was the great bay, behind it were two long barren hills”（日译为“四邊の景をいは前にはマンジー灣、後には二連の砂山あり”），在周作人的笔下变成了优美而有色泽的描写，“除此以外，更无别物，惟见黄沙白苇，萧瑟于荒江之畔而已。出前门不数步，即曼水之湾，水色波光，怡人心目。屋之后为二沙山，前后掩映有致”。另如结尾处之“惟有无情碧海，长此终古。江潮呜咽，日夜如语，仿佛有声发于水底云：‘恋，恶魔也！’”不纯叙景语，而融情于其中。

在语体方面，周作人刻意追求四字体句式的运用。四字体的句子在《荒矶》中很常见，有的是十分直观的纯四字句，如“天地晦冥，黑暗如墨，暴风迎面，不能前行”，“水色之眼，灼灼射人，曼理皓齿，风度绰约”、“回旋雀跃，羽衣纷

披。旋自户出，犹跃不止，并唱长歌，其音清亮”、“恨恨不已，面色暴怒，举动狂乱，势几用武”，此种情况不胜枚举。有的则是四字句为主，杂言为辅，如“次日头岑岑作痛，乃泛舟海滨，以吸受新空气。沿岸行不数里，忽觉渴甚，缆舟登岸。是处予知有清水，乃往寻之。泉流清洁，注入海湾，潺潺有声。予以手掬饮，凉沁心脾，宿渴顿解。起立欲行，则对面直立一人，即露国壮夫”；其中部分杂言实际上还藏有四字句，“次日〈头〉岑岑作痛”的阅读节奏即为二一四，“乃泛舟海滨”、“予以手掬饮”、“即露国壮夫”皆为一四，“沿岸行不数里”为二四。《玉虫缘》中虽亦有四字句，但只是自然而然地使用，远非自觉的追求。

相比《玉虫缘》之粗疏简拙，《荒矶》的译语显得摇曳多姿。除了四字体的灵活运用所带来的节奏感十足之外，《荒矶》声律谐调，用字绮丽，虽对仗、平仄之讲求较宽，仍偶带骈俪味道，铿锵之处如“予深恶人类，然人类亦甚恶我。彼等蠢蠢之行动，顽固之习惯，诈伪之言行，褊狭之气量，以及一二小善小恶龌龊之行，皆令予憎恨。而彼等于予之鯁直愚憨，不拘末节，不容忍社会之压抑，不遵从俗世之礼法，乃亦多所非难”，其余亦散见“探索玄妙之理，寻求造化之秘”、“赞予之英勇，且幸予之平安”、“此可哀之娘子！此可爱之娘子！”、“其额上深刻之皱纹，与额下卷曲之虬髯”一类较为整饬的句子。

虽然周作人追求以文章之法经营译语，但毕竟是以日译为中介，故而译文常常出现古文义法与外文译法之间的龃龉杂合。如“是年，入六月，三日阴沉之天气后，忽一极平静之日出来，其夕无一缕之风。夕阳渐下，隐见于西方一条紫云之间”中的“一极平静之日出来”、“其夕无一缕之风”、“西方一条紫云之间”，显系生硬之译；“于叔父遗财中，支出若干之金额，以之买集关于哲学科学之最新书籍器械药品等”一句，复坐此病。不过，《玉虫缘》中此类的句子也有很多，但放到《荒矶》中则显得格外碍眼，由此亦可反衬其语体古色古香之特色。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玉虫缘》与《荒矶》差异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何以同样是以日译本为中介，二者的翻译方法及文本面貌又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不妨先从翻译的时间方面来加以考量。

由于周作人乙巳年（1905）的日记缺七个月，故而《荒矶》的具体翻译时间一直不得而知。不过，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女子世界》的出版时间大致推算出来。周作人译完《侠女奴》的时间是1905年3月19日，刊发于《女子世界》第12期时，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事；同年4月17日，他“作短篇小说《女猎人》一首”，发表于第13期（第二年第一期）《女子世界》时，已经是7月中旬，在该期还有周作人的一篇小说《好花枝》，其很有可能是周作人4月25日思作而未果的“《舒幽怨》”，一直到1905年5月3日周作人暂停日记的时间，也未再见到与《好花枝》相关的记录。⁴⁵可知其完成当作5月之后。由此可见，周作人从完成著译到在《女子世界》上发表，大概要两个月左右的间隔。《荒矶》连载于《女子世界》第14期、第15期上，这两期的出版时间分别为1905年9月和1906年1月。可知周作人很有可能是1905年7月前后翻译的《荒矶》，如果《荒矶》也像《侠女奴》那样是分开译的，那么这篇作品的翻译时间拉得相当长。即便是一起译出的，从《玉虫缘》到《荒矶》，也至少有四五个月的间隔。这也就为其译法的调整提供了时间方面的可能。

1905年1月1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村居老农，能言之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不学之故也。今者，或乃瞽于西学，至欲唾弃国学，过矣。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⁴⁶译语的变化或许与他思想渐趋“主国粹”有关。1901年，周作人考江南水师学堂时的文章《“云从龙凤从虎”论》，被评为“文气近顺”，取为第二名；而后的一年里，于汉文课颇为用心，非常在意自己的期末考试成绩，竟然达到“盼汉文榜不出，如望家书之急”⁴⁷的程度；至1902年末，大发牢骚，称“下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实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仟悔。”⁴⁸第一节已然论及周作人摒弃旧

45 见周作人乙巳年三月十三日、廿一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411-412页。

46 见周作人甲辰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403页。

47 见周作人壬寅年正月廿五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15页。

48 见周作人壬寅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61-362页。

日文章之学而转为欧化的情况。1903年5月间，他还自嘲道：“作论二首，我自作只一百六十余字。年来作文，日就短少。从前半日工夫可成四五百，今则二百不能矣，江郎才尽乎？一笑。”⁴⁹从“一笑”可见其似乎并不以为意。然而，至1905年年初始又“主国粹”，而恰在此后略晚之时所译《玉虫缘》，语体便开始消除欧化痕迹；自然会在数月之后，译《荒矶》时，更为讲求文章性。

结论

在综述前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将《侠女奴》《玉虫缘》《荒矶》纳为整体，围绕这三篇周作人留日前的英译汉小说的日本渊源问题，做以续考。在结论中，笔者将尝试回答开篇提出的问题。

简言之，所谓周作人留学日本之前译出的6篇（部）作品，事实上只有4篇可以算作翻译小说。《女猎人》和《孤儿记》两篇看似是半著半译性质，很容易被后来的研究者算为译作。但回归周作人之本意来看，这两篇均意在创作。不妨先排列周作人1905年日记里所记与译事相关的内容：

甲辰年十二月十五日 “终日译《侠女奴》，约得三千字”

甲辰年十二月十六日 “抄译稿约三千字，腕力几脱”

乙巳年正月十四日 “译《山羊图》（美人坡原著）竟，约一万八千言”

乙巳年二月十四日 “译《侠女奴》竟，即抄好，约二千五百字”

乙巳年三月十三日 “作短篇小说《女猎人》一首”

乙巳年三月廿一日 “思作小说《舒幽怨》未果”

可见，在周作人的记录中，是“译”还是“作”，分野相当明晰。周作人对《女猎人》的定位就是创作，故而其《约言》说“大半组以己意”，尽管“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但核心在“以理想而造此篇”。可以补证的是，美国学者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曾据星德夫人的英文底本讨论过《女猎人》，认

49 见周作人癸卯年四月初八日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91页。

为：“此文根本无法明确归入任一分类，因为其打破了翻译、梗概、仿写、续书和传统小说评点的界线。”⁵⁰是否真的是一种独特文类，姑且不论，但它距离翻译显然较远。

至于《孤儿记》，无论其《凡例》，还是《缘起》《绪言》，皆指向自著。周作人回忆里也说，“我当初执笔，原想自己来硬做的，但是等到那小主人公‘阿番’长大了之后，却没有办法再写下去，结果只好借用雨果——当时称为器俄，因为在梁任公的《新小说》上介绍以后，大大的有名，我们也购求来了一部八大册的英译选集，长篇巨著啃不动，便把他的一篇顶短的短篇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原本前半却是苦心的做了”。⁵¹可见，《孤儿记》原初意在创作，尽管是“半做半偷的写了一篇文言小说”，但所“偷”部分的译法仍较为随意。

因而，周作人早期看似有直译和改译两种译法，但实际上，《女猎人》与《孤儿记》更接近于有本事参考的创作，而非译作。倘若将此二者纳为对象来单纯研究周作人的翻译，难免不得要领。早在1902年9月，周作人就已然表达过对译文乱改原作的反感，称“《泰西新史》，译笔不佳，喜掉文袋，好以中国故实强行掺入，点缀过当，反失本来面目”，并批评“忧亚子译《累卵东洋》亦坐此病”，感慨“译书非易事也”。⁵²忧亚子在《累卵东洋自序》里自信于对原作的擅改比“原作更益完善”⁵³。但在周作人的意识中，“译”是有其规则所在的。

至此，大体可以对周作人留日之前与译相关的文字活动，综合推断如下：在江南水师学堂训练之下，周作人掌握了直译之法。他的“初出手”《侠女奴》即是学堂译法的翻版，甚至是逐句逐词译，但因能力不到，只能借助英和字典的和制汉语。而后，由于有了山县氏和文译注本作为参考，使周作人有条件译出其英

50 韩嵩文：《萍云的狩猎旅行——早期周作人及其性别化的“感时忧国精神”》，王德威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6页。

51 《鱼雷堂》，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3》，第321页。

52 见周作人壬寅年八月初一的日记，《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340页。

53 忧亚子：《累卵东洋自序》，大桥乙羽著、大房元太郎译：《累卵东洋》，东京：爱善社，1901年版，第2页。

语能力不足以应对的《玉虫缘》和《荒矶》。尽管《荒矶》多有添饰，但总体来说仍算得上是比较忠实的。只不过这种忠实与《玉虫缘》相似，确切地说是对日语本的忠实。添饰的部分更像是锦上添花，对原本的情绪或景况稍作加强而已，并非任情改易，于原文似无大损伤。甚至，由于 The Man from Archangel 的词汇、句式相较简单，加之山县氏《荒磯》中日语汉字所占比重更大，故而周作人的《荒矶》，与其所译之《侠女奴》《玉虫缘》相比，误译和删节最少。然而，周作人自然会意识到比较严重的问题：按《侠女奴》的译法来译最合适，但显然太累也太慢，此刻的他已经是《女子世界》的重要供稿人，刊物的发行有时间的要求；而《玉虫缘》《荒矶》这类直接提供和制汉语参考的底本又一时难再求得。按说随着翻译实践的展开，翻译经验在累积，水准应该会有所提高。但周作人的英语水平实在有限，即便以大幅删削的方式来译《天鹦儿》这样的作品出来，既有误译的风险，又比较费力。于是，转向创作似乎是必然的选择。可是，自身的创作才能又有缺欠，故而《女猎人》《孤儿记》这种对英语原作随我取用的创作小说也便应运而生。周作人留日之前与译相关的作品表面上看似凌乱，但综合各类史料，做出平情的贯通之论，并非没有可能。

附录：

部分 1904 年以前出版的《天方夜谈》英文版本目录

- 1、Remarks on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T. Cadell, jr., & W. Davies, 1797.
- 2、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Edinburgh, Printed for the booksellers by Schaw, 1802.
- 3、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1811.
- 4、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Printed for F. C. and J. Rivington [and 17 others], 1821.
- 5、New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H. Colburn, 1826.
- 6、New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hiladelphia: R. W. Pomeroy, 1827.
- 7、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Exeter: J. & B. Williams, 1827.
- 8、New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H. Colburn, 1829.
- 9、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hiladelphia: L. Johnson, 1832.
- 10、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hiladelphia, Wardle, 1835.
- 11、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C. Knight and co., 1839-41.
- 12、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C. Knight and co., 1840.

- 13、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hiladelphia: Thomas Wardle, 1842.
- 14、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Printed by A. J. Valpy; Published by Henry Washbourne, 1844.
- 15、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London: J. Murray, 1847.
- 16、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Washbourne, 1849.
- 17、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Boston, Lee, c1852.
- 18、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Willoughby & Co. etc, 1852-54.
- 19、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53.
- 20、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and Co., 1853.
- 21、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Boston, Phillips, Sampson, 1854.
- 22、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hiladelphia, W. P. Hazard, 1856.
- 23、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Boston: Phillips, Sampson; New York: Derby & Jackson, 1856.
- 24、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W. Tegg, 1856.
- 25、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J. Murray, 1859.
- 26、Thousand and one nights. Boston, Lee and Shepard, etc., etc., c1862.
- 27、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etc., Routledge, Warne & Routledge, 1863.
- 28、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Cincinnati: G. S. Blanchard, 1864.
- 29、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864.
- 30、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Routledge, Warne, and Routledge, 1865.
- 31、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Boston, Lee and Shepard; Concord, N. H., E. C. Eastman, 1866.
- 32、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Toronto: J. Campbell, 1867.
- 33、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D. Appleton, 1868.
- 34、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New York, G. W. Carleton & co., 1872.
- 35、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London: Bickers, 1877.
- 36、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80.
- 37、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Philadelphia, Porter & Coates, 1881.
- 38、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New York, Ward, Lock & co, 1882.
- 39、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883.
- 40、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J. C. Nimmo and Bain, 1883.
- 41、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et al.: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85.
- 42、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F. Warne & co, 1885.
- 43、A plai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rinted by the Burton Club for private subscribers only, 1885-1888.
- 44、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G. Routledge & Sons, 1886.
- 45、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et al. : George Routledge, 1889.
- 46、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889.
- 47、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1890.
- 48、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hs.. Chicago, Donohue, Henneberry & co., 1890
- 49、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Chicago: Home Library Association, 1890.
- 50、Tal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and Edinburgh: Gall & Inglis, 1891.
- 51、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Boston, D. Lothrop company, 1891.
- 52、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F. A. Stokes, 1891.
- 53、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and New York: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894.
- 54、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hiladelphia: Henry Altemus Company, 1896.

- 55、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et al: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6.
- 56、The thousand & one nights, or,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Gibbing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896.
- 57、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898.
- 58、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Boston: DeWolfe, Fiske & Co, 1898.
- 59、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G. Newnes, 1899.
- 60、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hiladelphia: Henry Altemus, 1899.
- 61、A plai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Printed by the Burton Club for private subscribers only, 1899-1900.